

評介柯臨清著
《從社會性別角度看中國革命》

王 政*

書 名：*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作 者：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柯臨清）
 出版時地：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頁 次：303 頁

一、剖析中國革命的新角度

如本書書名所示，gender——社會性別是作者分析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革命運動的理論框架。^① 從社會性別角度出發，作者所關注的不

*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Davis) 分校歷史系博士

① 為了較清晰地表達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的核心概念 gender，我將其譯為社會性別，以區分於性別 (sex)。參見譚競嫦、信春鷹主編：《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彙釋義》（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

僅是表現婦女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內以及革命群眾組織內男女之間的社會性別關係更是作者探究的重點。以往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著述一般忽略社會性別，而本書則是作者將中國現代政治史與社會性別綜合研究的一個獨特成果。

以社會性別為分析框架，作者所發掘和闡述的是被以往許多學者所忽視的層面和問題。例如，新誕生的共產黨內的等級關係、黨內權力的多維度、革命組織內部的界限、有關婦女作用的衝突觀念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考察使本書在資料的選擇和展示共產黨活動等方面都不同於其它研究共產黨歷史的專著。如作者所說，在本書中，「共產黨內生活及活動的意識形態，文化和社會的層面比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指示決議更為有意義」。^②

為了深入了解共產黨內社會性別關係，作者特別注意二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文化。在這兒，柯臨清用了林恩·亨特 (Lynn Hunt) 對政治文化的定義，即：「表達和形成集體行動的價值觀，期望與含意」。作者以早期共產黨人的著述和傳記說明，受五四反傳統的思潮影響，共產黨不僅是一個新生的革命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個亞文化群。改變「傳統的」或「封建的」社會文化同政治變革的任務密切相關。對於這些文化革命者來說，反傳統包括反父權制家庭、父權制觀念以及傳統的婚姻制度。這種反抗不僅是理念上的，更是改變自己人生的一種實踐。如果說，五四女權主義的反父權制家庭，主張婚姻自由等內容表達了那一代文化革命者對新的家庭、性別關係的渴望，那麼，初生的共產黨則是那些離經叛道者的避難所。作者將共產黨作為一個亞文化群來審視，探究文化變革對共產黨人個人生活的意義，這不僅有助於解釋共產黨對五四女權主義的繼承，也是分析共產黨內社會性別關係的必要途徑。作者對這亞文化群的闡釋自然也豐富了讀者對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的認識。

自七十年代末以來，西方女權主義學者曾有一些研究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婦女解放之關係的專著。^③ 本書作者也是以這一關係為中心線索來展開

② 本書頁2。

③ Elis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1978);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Judith Stac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Los Angeles:

對國民革命的考察。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的關係一直是許多女權主義學者感興趣的問題。柯臨清的研究顯然也是出於這一興趣。不過相同的興趣並未導致雷同的著述。與其它幾部探討中國革命和中國婦女的關係的專著相比，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和不同之處。

第一，豐富的資料來源使作者得以深入考察以前西方學者知之甚少的歷史時期——二十年代國民革命時期。八十年代初中國的對外開放結束了西方學者隔牆觀望的局面，加之文化革命後中國出現的中國共產黨史料出版熱潮，尤其是對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的發掘出版，^④ 成為作者研究的優越客觀條件。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機會採訪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女黨員，這使她看到了西方很少了解的早期中國共產黨內女黨員的活動狀況，並由此產生了研究早期中國共產黨活動的構思。作者對女黨員的採訪成為本書的重要內容，一系列早期女共產黨員的肖像貫穿了全書對國民革命的描述。突出女黨員的活動使本書明顯區別於以前幾部側重分析共產黨婦女政策的專著。婦女不再是無聲無息被動接受男性決策支配的人物，而是在歷史舞台上開創了有聲有色的歷史劇的重要角色。

第二，基於豐富的史料，作者發現本世紀初中國的女權主義思潮對早期共產黨影響很大。不僅黨的一些創立者，如陳獨秀和李大釗，是女權的積極鼓吹者，五四以後高漲的婦女解放運動也成為共產黨的部分活動內容。而早期的女黨員則是在探索婦女解放的路途上加入了共產黨，並成為在黨內推進女權主義項目的中堅力量。早期共產黨的女權主義活動，尤其是國民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的高潮，說明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便拋棄了女權主義，如以前女權主義學者所批評的。柯臨清在本書中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hyllis Andor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④ 文革以後，恢復了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立即成立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著手編輯出版婦運史資料和編寫中國婦女運動史。各地婦聯也紛紛仿效，在八十年代形成了出版婦運史資料和各地婦運史的熱潮。其中主要的並為本書作者所用的出版物有：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和《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1986）；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史料，1924–1927》（廣州，1983）。

力圖表現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局面：一方面是共產黨對婦女解放的承諾及女黨員在發展婦女運動中的突出作用；另一方面是傳統的父權制觀念和做法在黨內持續發展，女黨員在黨內仍處從屬地位，作者對這一矛盾現象的探究無疑增添了本書的歷史厚度。

第三，為了闡釋為什麼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沒有像在歐洲那樣互不相容，作者著重分析了女權主義在中國出現的歷史背景，明確地指出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密切關係。近幾年來，西方女權主義學者比較關注第三世界中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對於中國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克羅爾在1978年出版的《女權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中已有所涉及。本書則更為深入地分析中國女權主義伴隨著民族主義出現的歷史過程，既指出這二者的密切關係是五四時期女權主義能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中國女權主義鼓吹者是男性知識份子。五四時期的新文化人士包括共產黨人都認為，婦女狀況的改善是建立一個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作者還強調列寧主義加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傾向，使共產黨能出於反帝的需要而支持各階級的反帝婦女組織。作者的這些基於中國特殊政治歷史背景的具體分析，清楚地說明了中國女權主義與西方女權主義的不同內涵。在這個意義上，本書體現了近年來西方女權主義學者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努力，即對非西方國家婦女解放的不同歷程不再以西方女權主義為準則來評判，而是力圖考察和揭示各國婦女的不同經歷與其所處的歷史文化之間的關係。

二、二十年代女革命者的集體肖像

本書描述的主體是女革命者和國共合作時期的婦女運動。全書分兩個部分：一、共產黨政治形成中的社會性別(1920-1925)；二、國民革命中的社會性別政治(1925-1927)。第一部分共四章，第一章著重分析第一代男性共產黨人對女權主義的態度，其餘三章突出描寫了早期女共產黨員的活動及探討她們在黨內的處境。作者從第一章開始便揭露了男共產黨人的矛盾言行：既主張婦女解放和開創新的社會性別關係，又對現存的性別等級習

以為常。從男子理所當然地成了討論婦女解放的主導聲音，到早期黨內正式職務僅屬男性，都顯示出這些激進文化革命者對傳統性別等級觀念的繼承。作者指出，在共產黨誕生初期，有害於改變社會性別關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對女權主義的排斥，而是共產黨對傳統社會性別觀念的容納。這個既激進又傳統的矛盾體便是女黨員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

以這一特殊環境為背景，作者考察了五四一代激進女性的作為。王會悟、高君曼、王一知、向警予、楊之華、劉清揚、鄧穎超、鍾復光、區夢覺等早期女黨員的身世與活動都在書中展現。這其中作者著重刻劃了王會悟和向警予在共產黨成立初期創立婦女項目的努力，以表現這些具有女權思想的革命者在黨內運作的策略和成就。同時，她以向警予和王會悟在黨內地位的波動來說明，新生的共產黨內出現了宮廷政治，女性沒有掌權的正式渠道，婦女通過黨內非正式的權力結構來運作。王會悟在黨內做了不少工作，卻沒有正式職務或正式代表資格。向警予雖然擔任了中央婦女部第一任部長，但是同王會悟一樣，她的權力來自她丈夫的地位。當王會悟的丈夫李達降職時，當向警予同蔡和森的婚姻出現問題時，這兩個女黨員的活動權限便迅速縮小。柯臨清指出的黨內宮廷政治確實很有意義，因為這種格局貫穿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即使在黨內正式職務和代表資格向女黨員開放以後，非正式權力結構仍然存在，夫貴妻榮的觀念與做法也在黨內成為常態。那一代傑出女性中多少人隨著她們丈夫在政治角逐中的敗北而沉寂。最後在人民共和國據有顯赫地位的三位：鄧穎超、康克清、蔡暢，均有顯赫和穩定政治地位的丈夫——周恩來、朱德、李富春。

五四那一代追求獨立人格的女性面對仍將她們視為丈夫附屬品的黨內政治，不知如何感想，如何反應？這是讀者自然會產生的問題。遺憾的是，對此作者沒能深入研究。雖然作者試圖分析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第一代女共產黨員是敢於向家庭和學校中的父權挑戰的非凡女性，她們為什麼會留在已出現社會性別等級制的共產黨內？她們對黨內的社會性別等級制負有何種責任？作者考察了這些女黨員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入黨的動機。她指出，在這些抵抗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女性心目中，共產黨提倡男女平等，為她們尋求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在這個亞文化群裡，她

們起碼實現了對婚姻自由的追求。儘管黨內存在不平等，但這些女黨員是沒有什麼退路的。即使她們已決裂的家庭仍收留她們，她們也不願再回到傳統的生活軌道上。為黨工作使她們的天地廣闊，人生富有意義。作者的這些分析是準確的，但仍然令人感到不足。作者沒有引用任何材料來表現這些女黨員的內心活動。她們是否因黨內的社會性別等級而煩惱，失望？她們是如何接受不平等待遇，又如何在思想上使其合理化的？由於作者未對人物思想心理過程作深入剖析，本書使讀者知道了那些女黨員做了些什麼，對她們想了些什麼卻仍不甚瞭解。作者聲明由於女黨員極少將自己在這方面的想法寫下來，因此資料很有限。但因作者在前言中特別說明採訪材料對本書的重要，所以讀者會產生本書將超越文字資料侷限的期望。可是作者的採訪材料並未在這方面彌補文字資料的不足。

對於女黨員在形成黨內社會性別等級制中的參與作用，作者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她們接受了仍體現傳統性別分工的工作——非決策性的具體行政事務，這最終成為黨內女性行為的界限；二是她們並未要求男性分擔家務，結果是家務以及育兒的重擔妨礙了婦女在政治領域裡的發展。這些分析說明，不論男女革命者的目標多麼激進，他（她）們都不可能與傳統徹底決裂。作者沒有論及女革命者若要向黨內的社會性別等級挑戰的特別艱難之處，對此我想進一步探討一下。如作者所注意到的，花木蘭是那一代女革命者的榜樣。我們都知道個榜樣的直接意義：鼓勵女兒家衝破社會性別界限，踏入男子的領地。在本世紀初民族主義高漲的政治環境中，它還意味著女子有同男子一樣的保家衛國的公民責任。這一榜樣對推動中國婦女步入現代政治舞台的巨大作用是無庸置疑的。不過，花木蘭的涵義不止於此。這一女英雄形象能在中國的父權文化中得到推崇、流傳，還因為她體現了中國傳統女性的一個重要美德——自我犧牲。花木蘭是替父從軍的，對現代花木蘭——女革命者來說，「父」字被「國」和「民」代替，她們的自我犧牲便顯得更有意義。當黨內的社會性別等級做法被貼上「革命需要」、「國家與人民的需要」一類標籤時，現代花木蘭便別無選擇，只有以自我犧牲來實現道德的完美。

在所有的的女黨員中，作者對向警予花的筆墨最多。通過對向警予任婦

女部長期間的工作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展示了共產黨內婦女擴大自己活動領域的積極努力。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作者對向警予提出了與其他西方學者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儘管向警予對女權運動有許多批評，但是在共產黨作出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開展民族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決定以後，向警予為聯合各界婦女，推動群眾性的婦女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作者評論道：「向警予為國民革命所渴望的對廣大婦女的動員奠定了組織基礎。她不僅培養了領導人才，加強了網路聯繫，而且還開始向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領導顯示了婦女工作的潛在價值」。^⑤ 本書中的史料充分支持了作者對向警予在婦女運動中突出作用的評價。儘管如此，作者的評價中仍有以下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關於向警予對任婦女部長一職在初期的不情願態度，作者認為是由於向受歐洲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衝突的影響，對中國的女權運動持批評態度，也不願介入。而一旦共產黨決定開展民族主義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向看到了與婦女組織協同工作的政治意義，她一改以往的消極態度，精力充沛地投入了開拓性的工作。我認為向對女權主義的看法不足以解釋她對婦女部長職務的冷淡，黨內並沒有規定這項職務僅能和女權主義組織發生聯繫。對向警予的內心世界，還是她丈夫蔡和森透露得最多。在蔡寫的〈向警予同志傳〉裡，他強調向總是不甘於「婦女的」工作（引號為蔡所加）。柯臨清也提到蔡的這一說法，但她解釋為這是蔡為向開脫責任的說法，因為國共合作時期的婦女政策在黨的六大上受到嚴厲批評。令人不解的是，柯臨清沒有注意到蔡對向不甘做婦女工作的解釋。蔡的整篇傳記追溯了一個女英雄的成長過程，向對婦女工作的態度產生於這個背景。據蔡所述，向從小立志要成為「天下第一個偉人」，「她不知道別的慾望，唯一的慾望只是要她能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蔡透露，因為向警予自幼形成的極強的好勝心，「自與和森戀愛及參加實際工作後，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種壓迫，以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來，彷彿是『奇恥大辱』。同志們愈說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個，她便愈不滿足」。蔡承認依向的能力她是是可以擔任黨的一般指導工作的，黨分配向負

⑤ 本書頁 95。

責婦女工作確實是黨在那時的「缺點」。^⑥ 蔡的這些敘述既暴露了黨內的社會性別等級制，又說明了向不甘做婦女工作的原因。顯然，儘管婦女部的設立為女黨員提供了黨內正式職務（婦女部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設立），但「婦女工作」是黨內性別隔離的領域，即使做到部長，也不過是被輕視的婦女領域的頭，那不是渴望在男人世界裡開創驚天動地事業的向警予的追求目標。

柯臨清也注意到向警予「模仿男性做法來發展自己在黨內的地位」。作者指出，在向被任命為婦女部長以後，她對婦女工作沒有任何動作，卻投入極大的精力與蔡和森一起辦《嚮導周報》。從1922年秋到23年春，向發表了二十三篇文章，都是反帝主題，而這類題目一般是由男性理論家論述的。向警予以此來證明自己「可以在黨內男性占統治地位的領域裡很好地運作。」^⑦ 可是柯臨清沒有探究向與男性並駕齊驅的願望同婦女部長一職的矛盾，這也許是因為作者未意識到帶著「婦女」二字的部長與其他部長在黨內權力的天平上分量之不同。

分析向警予的追求同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密切相關：向警予推動婦女運動的動機和目標。怎樣看待向警予從對婦女運動的冷漠到熱中的突然轉變？我基本贊同作者的分析：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決策使向警予看到了婦女運動的政治意義，即，動員聯合各界婦女參加國民革命。作者認為向警予的轉變反映了向的強烈民族主義精神。我認為除此之外還體現了向對政治權力的追求。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向警予的目標是統一中國的婦女運動。在國共合作圖謀統一中國的政治背景下，向看到了自己的歷史位置。她要將散布在全國各大城市、具有多種議題和目標的女權主義組織統一起來，並進一步發動底層婦女大眾，使全體婦女作為一支強勁的政治力量加入國民革命。如本書充分展示的，向警予在這個時期的言行說明她的確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領袖人物。不過我想指出的是，構成這位傑出女性的不僅是民族主義和女權主義，還有中國的主流政治思想。中國歷來的偉人

⑥ 見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載於戴緒恭等編：《向警予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⑦ 本書頁80和頁106。

都是以完成統一大業來稱雄稱霸，流芳百世的。向警予的統一婦女運動的大業顯然是對這一政治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今天我們如何評價向警予的政治思維模式和她的統一婦女運動的實踐呢？這是我的看法有異於作者的第三個方面。作者熱誠地歌頌了向警予和其他女共產黨員在國民革命中掀起婦女運動高潮的努力。毫無異議，國民革命中的婦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最廣泛的婦女政治參與。由於大批女權主義者的介入，也由於國共兩黨動員婦女的政治需要，這個由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吸收採納了五四女權主義的主要內容。在國民革命中心地帶，許多婦女第一次聽說了婦女解放，第一次體驗了婦女解放運動給她們的力量。女革命者們，包括向警予，將女權主義議題溶入國民革命運動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應看到，向警予統一婦女運動的政治宣傳和組織實踐使中國婦女運動的性質起了變化：標誌著由婦女開闢的社會空間的女權運動變成了由政黨領導和控制的婦女運動。正因為向警予有力地「向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領導顯示了婦女工作的潛在價值」，婦女運動從此被明確納入兩黨的勢力範圍。在共產黨內，由黨來領導統一的婦女運動很快被界定為中國婦女解放的唯一正確途徑。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裡便只有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而無婦女自己的社會空間。這種狀況持續到改革開放時代才有所變化。

向警予不僅在組織上開創了將婦女運動歸於政黨領導的模式，還對改變女權主義在中國政治話語 (discourse) 中的含意起了很大作用。從本世紀初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中，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伸張女權就是為了強國。正是在這一思想成為主導的新政治觀念時，中國才出現了高漲的女權運動，這是作者也分析過的。而到了國民革命時期，向警予及其她女共產黨人一方面在她們所領導的婦女運動中推行五四女權主義的議題；一方面則在她們的宣傳中重新界定女權主義。為了鼓動女權主義組織加入國民革命，向警予將民族主義從女權主義中分離。她告誡女權主義者們，不能「只爭女權不管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⑧ 她提出若不是在「普遍的民權運動中去爭女權」（即國民革命），那便是「狹義的女權的運

^⑧ 見〈中國婦女協會成立記要〉，《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頁388。

動」。^⑨ 女權主義一旦被抽去了民族主義的內核，它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合法地位便受到威脅。在向警予等共產黨人以是否加入國民革命為準則來區分廣義的婦女運動和狹義的女權主義之後，「狹義的女權主義」（也稱狹隘的女權主義）在共產黨的詞彙中成為貶義詞。從這個意義上說，向警予等早期的女共產黨員們既聯合了一些女權主義組織，使國民革命吸收了女權主義的議題，又開始了對「女權主義」一詞作負面定義的過程。換言之，女權主義一詞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地位的演變，是伴隨著以向警予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爭取對統一的婦女運動的領導權的鬥爭出現的。

三、國民革命與婦女運動

柯臨清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以三章之篇幅展現了國民革命中多姿多彩的婦女運動。她從五卅運動後婦女大規模的政治參與開始，追溯了婦女運動在上海、廣東、湖南、湖北、河南的發展。對於各地對婦女解放的不同反應，作者認為與太平天國的影響有關，她發現在太平軍經過的地區人們對婦女解放比較能接受。但因缺乏資料，作者未能在這有意義的發現上進一步探討。作者側重的是對婦女運動發展過程的描述，以及分析這場大規模婦女群眾運動的意義。在這部分中，作者也提到國民革命中女國民黨員的作用。

與第一部分的表現手法相同，作者力圖在建構婦女運動的過程中挖掘圍繞著社會性別的矛盾鬥爭。本書使我們看到，在國民革命的中心地區，蓬勃發展的婦女運動衝擊了父權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力，與此同時，革命運動內部卻在多方面採納了傳統社會性別的原則。作者分析了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一是孫中山的象徵意義。作者指出，國民革命創造了一套新的文化體系，構成了革命中心地區的新政治文化。圍繞著婦女解放議題

^⑨ 向警予：〈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443。共產黨人對女權運動的界定在1925年尚有多種說法，鄧穎超在此時稱之為局部運動。見〈鄧穎超在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發表演說，號召各界婦女參加民族獨立運動〉，《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頁347。

創立的新文化象徵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三八婦女節的慶典、婦女的集會遊行，對國際傑出婦女的宣傳和形象塑造等。作者注意到，國民革命沒有大力塑造中國婦女的英雄形象，一些女國民黨員試圖宣傳秋瑾，但未獲黨內支持。而在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卻不遺餘力地構造起一個革命之父的民族象徵。作者認為孫中山這強大的男性形象之樹立妨礙了女革命者為婦女解放建立一個象徵框架，其結果是她們只得依靠外國女革命者為榜樣。作者的這一聯繫似過於牽強。她似乎未看到，外國婦女榜樣不是對中國婦女榜樣的替代，而是具有中國婦女榜樣所沒有的特殊意義的。對於深受進化論影響的那一代文化革命者來說，歐洲的女革命者代表了先進文化中的先進力量。在國民革命中引進她們的形象，意味著中國革命與歐洲的革命聯為一體，中國革命在開創新的先進文化，中國革命者自然也成了與歐洲革命者同行的先進力量。簡而言之，宣傳外國婦女形象有力地表達了革命者在文化上標新立異的追求與加入世界先進文明的渴望，並非僅僅出於中國婦女尋找榜樣的需要。儘管作者將孫中山象徵與外國婦女榜樣的聯繫存在上述問題，她對孫中山象徵的歷史構成作女權主義的質疑卻是本書的一個獨到之處。

作者的另一個例子是共產黨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對婦女問題的態度。國民革命中婦女的參與不僅是參加婦女協會，大批農村婦女也參加了農民協會。作者指出，彭湃作為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非常重視動員農村婦女參加農民協會，在早期也支持婦女協會的發展。但是當他意識到婦女問題（如離婚權、買賣婦女、童養媳等）的解決與男性農民利益的矛盾後，他便對婦女問題表現出謹慎的態度。在他主辦的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裡，女性學員為數極少，課程設置上也極少有關婦女的議題。作者認為，彭湃和其他共產黨組織者將農民協會建構成男性身分，他們在1925年提出的「國民黨是父親，農協是兒子」的口號便是最好的說明。作者還指出，彭湃的父權意識隨著他地位的提高日益流露出來，這不僅表現在他接受農民給他的「皇帝」稱號，更表現在他違背五四反多妻、反納妾的女權主義原則，與妻子和情人同居一寓的做法上。作者所發掘和採用的史料有力地說明了她的論點：傳統的父權文化在國民革命中既受到挑戰又得到延續。令人感到不

足的是，作者未提到婦女的反應。女農協會員對表達男性身分的農會有何看法？彭湃的情人許冰，一名女共產黨員，怎樣接受她無異於妾的地位？也許是受資料所限，作者未能深入剖析這類可以在更深的層次上展現當時政治文化的問題。

本書的一大特點是集中表現了國民革命時期婦女的廣泛政治參與。通過對當時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展現了這場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國民革命軍同軍閥部隊在戰場上為最終的政權而戰時，廣大婦女則動員起來，為改變有關中國女人的文化含義和社會規範而戰」。^⑩不僅是爭離婚權、解放婢女具有這樣的革命意義；剪髮、放足、參加婦協活動，都是向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性別關係挑戰的行為。柯臨清指出，社會性別問題成為開創一個新國家的鬥爭中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重新界定政治秩序、家庭道德以及男性女性的核心。

牽連著社會各階層的社會性別變革自然引起各種爭議乃至激烈的抵抗，對於這一點，作者給予充分的關注。作者認為，保守勢力對婦女解放的敵視和抵抗明顯地表現在國共分裂後國民黨和軍閥對婦女活動份子的暴行上。她指出，對婦女活動份子的白色恐怖目的在於壓制婦女的群眾運動，懲罰婦女的政治參與，這實際上是承認婦女在公共領域的活動是向傳統社會性別關係挑戰的有力方面。作者的這一分析有一個缺陷：她沒有說明被屠殺的婦女活動份子的黨籍。從她例舉的受害者看，遭到暴行的都是共產黨人或被懷疑為共產黨人。而作者在第二部分的開端特別說明，國民革命中許多女國民黨員也在基層參加了對婦女的動員，並且她們同共產黨活動份子的「樣子和言行都差不多」。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白色恐怖是針對共產黨的，還是針對女權主義者的？二、如果國民黨中的女權主義者不是白色恐怖的對象，那麼國共分裂後她們的處境如何？也許需要追蹤兩黨中的女權主義者在國民革命失敗後的命運，才能較全面地把握白色恐怖的含意。

柯臨清最後指出，儘管國共分裂使一場轟轟烈烈的婦女群眾運動風流雲散，兩黨在新的政治局面中對婦女解放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保守態度，但

^⑩ 本書頁193。

是，兩黨同時又或多或少地繼續各自對男女平等的承諾，婦女解放的議題也始終同現代化的日程相聯繫。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以後繼續使用早期婦女解放的語言和儀式，這成為願意利用這一切的人的合法基礎。作者這些見解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的延續性。本書對五四女權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持續影響的關注是西方著述中不多見的，也可說是本書的主要貢獻。

綜上所述，我認為作者的選題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對史料的發掘和研究也下了很大工夫。本書的不足之處在於作者的研究方法比較「傳統」，而這往往限制了她對問題的深入剖析。比如，對歷史人物的採訪材料是本書的重要資料。對敘述者 (narrator) 口述材料的篩選、使用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重構過程，研究者應意識到自身和敘述者的侷限與傾向，並使讀者對此有所認識。本書作者則將採訪材料如同其它文字資料一樣對待，未能對敘述者也參與對歷史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這一特點作清醒的分析。並且，作者極少直接引用敘述者的原話，卻主要用第三人稱來敘述敘述者的故事。那些平鋪直敘的故事不僅使敘述者的形象缺少立體感，而且在讀者心中產生疑問：作者的再敘述與敘述者的原話有無距離？作者的再敘述和對口述材料的摘選在何種程度上已是作者的闡釋 (interpretation)？在後結構主義理論影響下，西方學術界日益表現出對語言、敘述在文化意義構成過程中的複雜性的警覺。作者則游離於這一學術思潮之外，以傳統的方法處理她的語言文字材料，這可能是本書讀來覺得較少新意的主要原因。